

世界现代化研究丛书

制造 奇迹

拉美与东亚
工业化的道路

[美] 加里·杰里菲 编
唐纳德·怀曼

上海远东出版社



中财 B0078194

制造奇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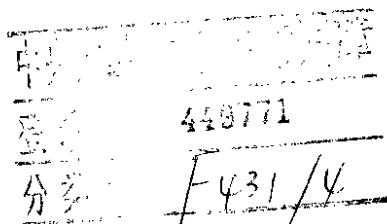
——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

CD34/01

〔美〕加里·杰里菲 编
唐纳德·怀曼

俞新天 张建音
王 健 柴惠庭 译
沈志彦

俞新天 禾 声 校



上海远东出版社

Copyright © 1990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ublished b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1 William Street,
Princeton, New Jersey 08540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Manufacturing miracles: paths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East Asia / edited by Gary Gereffi and Donald L. Wyman.
ISBN 0-691-07788-6

449771

制 造 奇 迹

——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

[美]加里·杰里非 等编

俞新天 等译

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冠生园路 393 号 邮政编码 200233)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美术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 字数 375000

1996 年 6 月第 1 版 199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80613-279-1/F·196 定价:25.00 元

译者序

提起新兴工业经济,人们脑海里首先浮现出东亚和拉美的一些国家(地区)。虽然同样实现了高速增长,但东亚和拉美的工业化道路不同,其经济和社会后果迥异。对两者进行跨地域比较,不仅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且会引起公众的兴趣。《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正是这一专题的佳作。13位富有造诣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经过多年的研究,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不同的侧面,揭示东亚和拉美发展“奇迹”的奥秘,展望了两个地域继续前进的困难与远景。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跨地域、多学科、历史性的比较研究,使经济理论著作呈现出立体性的新貌,有些方面剖析得透彻深刻,有些方面极具创见,有些方面技巧地提出了有待思考的问题,留出了开放性的余地。为了把微观研究与宏观把握连接起来,作者们尝试了多层面的分析框架,便于人们全面理解东亚和拉美的工业发展战略和类型。这四个层面是:世界体系层面、国家(地区)层面、机构组织层面、推动个人行为的文化层面,如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这些层面不是并列的,而是层层套叠,像鸡蛋的蛋壳、蛋白和蛋黄一样。最外层是世界体系,最

内层是文化层面,其因果关系基本上是外层决定内层。所有这些层面都从属于某种程度的选择和变化,并且经常出现由低层到高层的颠倒的因果关系(虽然不明显,而且暂时滞后)。作者对每一层的阐述都闪耀着独到之见的火花。例如最外层的世界体系,包括世界经济联系和国家间体系。世界经济对一国(地区)发展结果的联系,主要通过外贸、外资、外援和外债这四种形式。获得跨国(地区)经济联系有利于特定的发展战略的实施,而缺少它则会限制决策者的选择。国家间体系则要分析国际关系格局及一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特定地位。世界体系的动力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它对国家(地区)发展既提供无限机会,又有所限制,它会造成“势所必然”,迫使一国(地区)转变战略。然而,它主要确定了新兴工业国(地区)所不能走的道路,而不是决定其随后的工业转变的方向。国家(地区)采纳的发展战略更重要地取决于国家(地区)内部的机构和联盟。众所周知,世界体系的作用一直是现代化和依附理论分歧的焦点之一,本书吸取了双方论证中的合理性,避免了两者的片面性,提供了新的视角,并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相结合,也是本书取得理论突破的原因。例如,人们容易概念化地理解模式,在讲到东亚和拉美工业化道路时简单化地归之为“出口导向工业化”和“进口替代工业化”。从更广阔的历史观点,本书把拉美和东亚工业化分为五个主要阶段:产品出口阶段,初始进口替代工业化,出口导向工业化初始阶段,第二

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出口导向工业化第二阶段。其中三个阶段是外向的,两个阶段是内向的。拉美与东亚在最早的产品出口阶段有共同性,都是出口农、副、矿初级产品和原料。接着,两个地域也都实行了初始进口替代工业化,但拉美采用这一战略的起步更早,时间持续更长。由于两个地域对初始进口替代工业化问题采取了不同方法,因此后来便分道扬镳,东亚进入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初始阶段,而拉美则开始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但在70年代和80年代,拉美致力于初级产品和制造业的出口,补上了出口导向工业化初始阶段,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却实现了重化工业化,完成了第二阶段进口替代工业化,双方在战略上进一步趋同。80年代之后,它们都成功地转为出口增长更多样化的类型。很显然,内向和外向发展战略,都不是经济的万应灵药,都有其局限性和脆弱性。国家政府应当根据国际国内因素,灵活地选择政策,以便达到既定的发展战略。这样的分析言之有据,丝丝入扣,令人信服。书中对于外资的引入,跨国公司的作用,直至主导产业的建立,都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升华。

经济战略与政策永远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每个政府的决策都受到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体制的影响,其间的关系纷繁复杂。本书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极具启迪作用。例如,在7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都实行了重化工业化,但韩国选择大推进的方式,而台湾地区则采取渐进的方式。人们往往认为,韩国大推

进方式是为了应付贸易和安全两方面日趋恶化的环境，其实台湾地区也面临类似问题。可见，关键不在安全环境本身，而在于当局精英如何理解问题。韩国要通过重工业化加强国防力量，而台湾地区更注重分配问题。韩国大力提倡民族主义，建立了联合大企业的经济集中。台湾地区却以更多的中小企业维护了政治稳定。从东亚与拉美的比较看来，阿根廷政府相对软弱而社会力量十分强大，在台湾地区，从事发展的当局相对强大而大众阶层相当软弱。位于以上两极端之间的是巴西和韩国，其强有力的政府面对着具有不同效能的社会集团。大众阶层可能对国家（地区）发展战略发挥某些作用，他们确定了在某些程度上被当做战略目标的发展需要，确定了人力资源和社会组织资源的制约因素，提出分配和福利要求，以或小或大的压力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但其发挥作用的大小却因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的不同而有实质性的差异。

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在非经济联系中进行，现在大概已经没有人否认文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思想方式和价值观比之于确凿的经济数据来，显得玄妙而不可捉摸，使人们谈论起来总有点迟疑不决。“文化论”和“制度论”代表了基本的争论。前者认为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有较大的作用，而后者则主张政策和制度的影响更甚。正确的答案似乎在两者之间。本书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有两点“落后优势”，一是学习先进国家中的经验教训，二是落后意识和要求赶超的紧迫感可以动员国民

投入现代化。但落后意识的强弱则与各民族的国际环境和情感体验有关。文化和心理的因素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决策者突出考虑的内容，而且因为它会影响政策被大众接受的程度。只有人民都相信这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只让部分利益集团得利时，他们才会拥护发展战略和政策，并团结一致地为之奋斗。本书还专门研究美国和日本对拉美与东亚发展的影响，发现韩国发展接近日本，而拉美则更多地仿效美国。这里，人们不能不看到部分原因是文化的接近。有趣的是，在70年代末墨西哥和巴西曾参照日本经验，试图重定其工业战略，然而它们却无法再造对日本至关重要的两大要素：普遍的社会经济公平和企业家的领导权。制度和政策对于经济发展当然至关重要，然而在它们的背后仍隐伏着文化。正如书中指出的，东亚的储蓄率高，拉美的储蓄率低，并非纯由银行利率所决定。本书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1991年当我在美国作访问学者时，曾专程拜访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学者、《中国的现代化》的作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先生。他向我热情推荐本书，盛赞其比较研究的功力。我一读而不能释手。在上海远东出版社的支持下，我回国之后即邀请几位同事将此书译成中文。书稿杀青时，恰逢我国实行版权法，这是尊重知识产权，与国际接轨的好事，但我们也有几分担忧，不知我国读者是否无缘得阅此书。我向素昧平生的加里·杰里菲教授发信，杰里菲先生迅速给予答复，积极支持中译本的出版，

主动请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转让中文版权,并慷慨地放弃中文版初版税,真令我们喜出望外。这一段书缘不可不记录下来,以表谢忱。

本书的序言、第一章、第二章和第十四章,译者为俞新天;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和第十二章,译者为张建音;第五章、第十章和第十一章,译者为王健;第七章、第八章和第九章,译者为柴惠庭;第十三章,译者为沈志彦;中文版序,译者为黄崧林。本书的校译为俞新天和禾声。

俞新天

1996年3月

中文版序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人们对如何解释东亚和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在经济成就方面的显著差异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尽管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石油价格上涨,全球性经济衰退,货币升值,以及主要出口市场日益加剧的保护主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却能保持创纪录的工业增长率与旺盛的工业制成品出口,于是人们称它们为“奇迹经济”。此外,这些国家(地区)经济的飞速增长带来了日益增高的人均收入、较低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平等以及教育、卫生和住房等有关人类福利的其他方面的显著改善。1990 年,当《制造奇迹》首版问世时,东亚的这些经济成就大多被归因于一种以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工业制成品出口为基础的外向型发展战略。

在 90 年代中期,东亚的经验继续给观察家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它的经济活力已经被迅速而有效地转移到不同类型的邻国。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之一,而东南亚各国正在享有很高的和它们的东北亚邻国十多年前十分相似的工业高增长率。显然,当我们迈向 21 世纪时,亚洲地域可以提供许多关于怎样才能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制造奇迹》的诸多论题中有好几个方面与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第一，中国是一个大国，有着勤劳的人民与丰富的自然资源。本书所分析的拉美和东亚两个地域各国（地区）各自具有的主要长处和有利条件，在中国则是兼而有之的。因此，中国的发展战略将使内向型和外向型工业化的优点交融在一起。这是世界上许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国家面临的一种挑战。东亚和拉美在这方面的众多有关经验，本书各章都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我们知道，东亚出口型工业化模式之所以很成功，是因为它能够充分适应各种不断变化的内外条件。在70年代，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的主要出口部门——服装、鞋类、玩具等——都属于劳动密集型。到80年代，人们已更强调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汽车、电子计算机和先进机械。在90年代，由于劳动力短缺、工资上升和货币升值不断加重对传统出口商的压力，东亚各国（地区）成了世界范围内外国直接投资的重要资金投向。同时，对更为先进的产品的出口的关注使原来专门替外国客户制造产品的东亚厂商得以营销自己的名牌产品。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经历着这个产业升级换代的过程，它的各种产业也已经开始了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从简单产品向高附加值产品、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仔细分析东亚和拉美国家（地区）的不同发展轨迹，对于成功地驾驭这种转变将会大有裨益。

第三,地域化正在成为环球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在欧洲和北美,各国政府通过正式协议已经在建立起意在重组环球贸易和投资网络的地域经济集团,世界经济正在向国际化生产更为复杂的各种形式发展,其中不同地域内的某些国家既是诱人的市场,同时又是极具吸引力的出口中转站。在亚洲,实际上已存在地域性的一体化模式,而这种一体化部分是由亚洲、美国和欧洲的跨国公司的战略所促成的,而且在多数情况下这种进程都不曾有过政府间的协议。因此,我们可以提及的是,亚洲将出现的是由市场引起的而不是政策导致的经济一体化模式。

不管亚洲出现什么样的地域分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其中都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许多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是吸收外国资本的一个重要东道国,而且它热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将如何进行协调继续扩大它的出口市场的机会与日益增长的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之间的矛盾?国际制造业的各个部门已经出现专业分工的趋势,中国是顺应这种趋势,还是争取成为一个较充分一体化、较强调自主的工业大国?中国将如何估计在它境内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未来效益和成本?1997年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这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贸易流通和商业服务都将会有什么影响?中国对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回答将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改变亚洲的面貌。作者希望,读者在阅览本书时能够发觉,对东亚和拉美的发展所作的比较和历史的研

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面临当代中国的种种机会和挑战。

加里·杰里菲(杰瑞飞)

1995年6月

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

序 言

在第三世界，工业发展的速度、规模、道路和政策是极其多样的。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比拉美和东亚更能反映出这种差异性。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长期持续的内向工业化历史可追溯至 30 年代，而东亚“四小龙”——韩国、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自 60 年代以来就取得了以制造业出口为基础的外向工业化的显著成就。人们有时会把这两种工业化道路描绘得截然不同，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就会揭示出它们之间由共同性、变异性和趋同性组成的复杂而奇妙的图景。

拉美和东亚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地区)，已经成为形形色色解释第三世界发展的理论和观念的焦点。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现代化理论、新古典贸易和投资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各种专论，都被用来试图解释拉美和东亚发展的嬗变。但是，根据这些理论观点得出的解释常常导向错误，因为它们来自于对这两个地域情况有所取舍而且带有片面性的分析。本书试图通过扎实的比较研究来填补这条鸿沟，并利用这两个高速发展地域的工业化经验，来探索当代世界

工业化不同的成功途径。

本书的观点兼及跨地域、多学科和历史性。作者均是专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然而,许多作者发现,自己必须超越原来的专业特长,进而探讨政策选择和发展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本书大多数章节将注意力集中于拉美和东亚国家(地区)所处的历史背景,以便为概括这两个地域所特有的发展模式提供更广泛的基础。

本书的第一编是拉美和东亚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轨迹的跨地域的概述。它超出了内向和外向工业化的简单概念,从而突出了看似矛盾的发展道路之间的相互联系。本书的第二编以比较和历史的方法,探讨拉美和东亚发展中不同的行为主体的作用,主要集中于外国资本、地方私有企业、国家和大众阶层。它通过描述新兴工业国(地区)工业发展特定阶段的顺序、实施和社会政治基础,揭示出两个地域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别。本书的第三编专门研究新兴工业国(地区)发展战略如何影响其工业运行方式的形成。有两个主题是特别突出的。其一是探讨政府引导和追随国内外市场力量的程度,以及这些模式对当前关于新兴工业国(地区)政府干预展开的讨论的意义。其二是涉及这两个地域当前发展战略对于其下阶段工业化的影响。本书的第四编则着重阐述了在全球、地域、国家和地区各个层面上比较发展研究的新议题。

本书得到许多机构和个人的慷慨支持和指导。加利

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承办了首次讨论和随后的学术会议，为本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经济方面，这个多年研究项目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威廉和弗洛拉·休利特基金会和美洲研究院对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的资助。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并拨款给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为本书平装本的出版提供方便，并帮助支付了本书定稿所需的前期费用。

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主任韦恩·A·科尼利厄斯，对唐纳德·怀曼和我本人完成这一项目的努力，始终给予巨大支持，我们受惠至深，谨致谢意。所有参加怀曼和我组织的在中心举行的讨论和学术会议的人员，都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它们在本书各章节中已有充分反映。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美国—墨西哥研究中心和杜克大学社会学系的有关人员，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无私地奉献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我特别要感谢学术会议的报告起草者和本书最后一章的合著者克里斯托弗·埃利森，他对最后成书多方协助，卓有贡献。

编完并出版一本书对所有参加者通常是一件乐事，但是这次同时又充满了悲伤。我的合作者唐纳德·怀曼在1987年因患癌症英年早逝。唐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一位宽厚高洁、富有灼见的同事，一位热情的朋友，一位忠于家庭的男子汉。所有的相识者都为他的猝离人世感到震惊。我和本书其他作者向唐的夫人巴巴拉以及他们的

两个孩子吉米和梅雷迪思表示慰问。为了向他和他的家庭成员致意，本书谨献给唐，永志怀念。

加里·杰里菲